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31

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美] 徐国琦 著 马建标 译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美〕徐国琦 著 马建标 译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美]徐国琦著;马建标译. —2 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6

ISBN 978 - 7 - 5426 - 4209 - 7

I. ①中… II. ①徐…②马…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中国②外交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K258.06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5900 号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著 者 / [美]徐国琦

译 者 / 马建标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23.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209 - 7/C · 475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7123907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

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文版序言

20世纪90年代我负笈美国求学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专业是美国史。原申请的指导老师是Ernest R. May教授。恰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我报到之前开始在哈佛执掌教鞭,鉴于他刚到不久,研究生尚不多,系里安排我转投他的门下。因缘际会,我因此有幸拜入江昭教授为师,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美国史及国际史。入江昭是西方用全方位、多视角、多国档案研究美国史及东亚史的奠基人及集大成者。本书即系我忝列入江先生门墙后的习作。令人高兴的是,该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旋即经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的推荐,上海三联书店以宏扬天下学术为己任,欣然同意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请复旦大学的马建标先生担纲承担翻译任务。在建标先生及出版社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本书终于同中文读者见面,至感欣慰,借此机会向所有关爱此书中文版问世的同仁特别是建标先生和陈恒教授谨致谢意!

《中国与大战》一书系本人用国际史方法、多元视角研究中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这是我近几年所做的中国与国际化、国家认同问题系列研究的第一部。第二部系从体育角度来审视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历史,题目叫“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计划尽快推出该书中文版。目前正撰写该系列的第三部,题目初步定为“文明的交融:一战华工与中国的国际化”。该书的普及版现已完稿,并

由北京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在 2007 年秋用中文和法文出版。其英文版当能在 2009 年杀青,并会以英文在美国首先出版。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全球视野、全面占有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全新解释重要但缺乏研究的相关历史题目。其中文版分别问世后,如能在方法上、观点上、资料上给国内学术界带来启迪,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则幸莫大焉!

徐国琦

2007 年仲秋于密西根湖畔

英文版自序

1980年代后期我与一些学界同仁合作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当我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颇为中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所发生的巨大反差所困惑。我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题目的兴趣即形成于此时。1990年代初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很快决定博士论文将侧重中国与一战关系。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入江昭教授对我的选题与写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和 Ernest R. May。他们像入江昭教授一样，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利用其渊博学识以及深刻的洞察力，言传身教，多方鞭策。如果没有这三位导师的指导，本书也许无法达到目前水平。

我要感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过帮助的多家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慷慨提供多年奖学金。德国克鲁伯基金会出资让我到德国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巴黎和伦敦花费6个月的时间去查阅各种档案。来自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的资助促成了我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一行。哈佛大学历史系资助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度过一个收获颇丰的暑假。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任命我为该中心专为研究生设立的研究员位置达三年之久，并提供办公室及其他研究资助，使我得以在那里与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辩难和讨论。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亚太事务联合研究中心以及密歇根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在我从事本书研究的不同阶段予以慷慨支持,对两中心的历任负责人 Ernest P. Young, Martin Powers, Paul M. Evans 和 B. Michael Frolic 的热情帮助,不胜感激。我所任教的卡拉玛祖学院允许我学术休假,专事本书的写作,在此也谨表谢意。

本书的完成还得到许多个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终生导师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他为了把我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感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三井教授和张力教授,他们二位的热情帮助使我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术研究受益匪浅;感谢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的 Calvin Hsu 先生,当我需要资料时,他总能提供及时帮助。我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高校作有关本书主题的报告时,或在参加的诸多学术会议上,深受听众评论的启发,他们的建议和指正让我受益良多。此外,我要特别感谢如下诸位:2001 年我有幸与叶文心教授同时出席在柏林召开的有关中国国际化的学术研讨会,她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宝贵建议。感谢 David Strauss 以及本书的匿名审稿人,他们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评论。我还要特别感谢杰·温特教授(Jay Winter)对本书的赏识,并推荐本书纳入由他所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现代战争社会文化史丛书”。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伊丽莎白·豪伍德(Elizabeth Howard),她是所有作者都梦寐以求的理想编辑人选,她的建议和鼓励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对特瑞·菲歇尔(Terre Fisher)表示深切的谢意,她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许多章节,并提出许多批评和修改建议,从而使本书在样式和内容上都大为改善。多亏她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语言技巧,否则本书最后的文字风貌将失色不少。感谢威廉·劳伦特(William Laurent)通读全稿,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莎贝尔·戴姆布里考特(Isabelle Dambricourt),她不仅帮助挑选了一张欧战华工的图片作为本书的封面,而且其很高的工作效率促成本书早日问世。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能理解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我作为

长子,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周游世界却很少有时间写信或看望他们,对此他们也从未抱怨过。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妻子尤卫群的感激之情,多年来没有她的鼓励、支持和牺牲,本书将无法完成。感谢我的子女,玛格丽特、朱丽娅和汤姆,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本书漫长有时甚至是苦闷的撰写过程中给了我支持及灵感。孩子们的耐心、理解和日常的娱乐放松使本书得以及时问世。上述所有学术机构和个人都有权分享本书可能获得的荣誉;但一切错谬由作者自负。

目 录

1	中文版序言
1	英文版自序
1	导言
18	第一章 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
51	第二章 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
85	第三章 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121	第四章 中国的替代战略：“以工代兵”计划
168	第五章 中国正式参战
216	第六章 内 战
258	第七章 1919 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297	结语
303	附录
305	参考文献
340	索引
358	译者后记

导 言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无所不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¹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20 世纪的法国“有两大困扰”,一是如何处理法德关系,二是如何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²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蒙受巨大的困惑:即如何作为平等成员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人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及路径来研究中国历史,但中国人对平等融入国际社会的执着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强烈关注影响到中国对自身、外部世界、中外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理解。

我们还认为,20 世纪中国发生的诸多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密切相关,还受到这一愿望的推动(我称此为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在此种意义上讲,也可将其视为伏尔泰的“革命世纪”³的自然延伸。1925 年 3 月 11 日,一向被共产党人誉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一份简明扼要的政治遗嘱,这份遗嘱既是对孙中山一生政治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人的垂训。遗嘱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⁴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是只要推翻满清王朝或实行三民主义；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孙中山的许多政敌可能并不赞同他的革命理论，然而他们大都接受孙逸仙努力获得国际承认以巩固其革命的信念。因此，如果我们把 20 世纪称为“中国的革命世纪”，那么中国的历史剧变就像 1789 年法国革命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一样——两者都聚焦于国内政治和对世界输出革命经验——不仅进行国内政治斗争，而且还旨在将中国以新国家的面貌推向世界，加入民族国家的阵营。

看看中国人对国际声誉、民族自豪以及历史上的挫折的过分关注，许多今天貌似孤立且非政治性的事件就能理解了。几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引发的举国震动就是例证。对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还有深远的内涵。中国人将承办奥运视为中华民族获得国际承认的漫长征途上的确据，是中国摆脱“屈辱的百年”、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象征。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期待，在 1993 年北京初次申办 2000 年夏季奥运会败给悉尼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感觉西方还是视中国为三流国家，并阴谋阻挠中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故而，当北京成功获得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举国将其视为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一步。2001 年 7 月 13 日的晚上（投票公布的当日）被次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13 亿中国人民的不眠之夜”。据《纽约时报》报道，申奥成功次日，北京许多人唱着国歌来庆祝那一重大喜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⁵

中国人对举办奥运的热情，表明中国人争取国际平等和为国争光的愿望渊源有自。然而，这种鲜明而又根深蒂固的关注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这种热情可否追溯到某个能使它化为行动的特定历史事件抑或至少能从中获得认同？尽管

很少有学者关注上述问题,但是这对人们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中国力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爱国激情已经初露锋芒。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激发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本书旨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界观的转折点等问题。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⁶无论是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何?显然,就在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课题时,学术界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却汗牛充栋,并且公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⁷许多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优秀著作,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⁸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代沟问题研究。⁹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无知时代的终结”,¹⁰近来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¹¹。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如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新论》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¹²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悲怆》也没有提及中国,尽管论述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尼氏著作的说服力。¹³难怪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但未能明了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¹⁴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可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相媲美的有关中国公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应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系统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版本,如今何在?¹⁵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其间中国的外交是如此没有作为,乃至受到其他大国的推动才被迫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怎样?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何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最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国际化?所有这些问题势必通过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

4 仔细地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国际体系里一直被边缘化,而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证实那种传统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或没有改变现状的动机。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时,弱国会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改善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由于塔列朗的出色外交,这个战败未久

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甚至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欧战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反映了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对本国国际地位的重新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尔不凡。最近,柯伟林有公允的论述,他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非凡,尽管当时中国的国力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清帝国的疆域依然保留。更准确地说,清帝国版图就是中华民国的疆域基础。这也许是中华民国外交的最大功绩”。¹⁶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民国为这一骄人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人们将难以完全领会柯伟林的观点,如果不能认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国际主义外交,这一时期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

5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古代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阻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步的反动因素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国家主义而非儒家学说;民族国家代替文化主义),欧美留学生,积极进取的新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现代印刷媒体,尤其是变化中的国际体系本身,所有这一切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复兴。

在确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寻求国家认同的努力上,公众舆论动员和社会知识精英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人对参与国际事务从未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打算实行旨在振兴国家的新式外交以及加入国际社会。遗憾的是,这种蓬勃生机、活力及激情在传统的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中荡然无存。

国际史与中国国家认同研究

如果采用国际史视角研究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上述问题。著名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和韩德(Michael Hunt)等人所使用的国际史方法,似乎比传统的研究方法更可取,他们已在这个较为新颖的研究分支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¹⁷入江昭指出,国际史不像传统的外交史,它尽力“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而且由于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所以研究这些体系间的关系必须考虑“特定体系内部的本质特征,同时考察它们是如何影响各个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¹⁸换句话说,国际史的研究方法除注重传统的外交史研究思路外,还关注宏观的历史,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它研究国际上大国体制与特定的文化理念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民族理想与集体失望的关系,再次借用入江昭的话说,它研究国际事务是“根据梦想、抱负和其他人类意识表现”。¹⁹这种方法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看上去是更可靠的研究指针,借此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对两大世界秩序体系关系的处理:强调文化道德因素的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主要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西方世界秩序观。

因此,我们分析中国积极参战的历史背景将着眼于过去常被忽略的中国外交的思想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是怎样受到世界秩序的整体影响,以及参与创建这一世界秩序的贡献。国际史视角也强调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